

文史天地[®]

天地间莫非文史 文史中别有天地

2012.8

- 南海古今话主权
- “反革命”罪的由来与北伐中的武昌之战
- 周恩来一生中十一次历险
- 一场离婚案引发的社会变革

全国“百种优秀期刊进连队”入选期刊
全国网络阅读“三个百强”期刊
贵州省第一届“十佳”期刊



国内刊号：CN52-1135/K
国际刊号：ISSN 1671-2145

定价：7.5元

顺上还是爱民

■ 孟宪实

人在官场,很难不顺应官场规则,否则很容易遭到淘汰。凡人都会有良心,或来自家庭熏陶,或来自读书教育,即使人在官场,也时刻受到良心的监督。人生总会有几个特殊时刻,在良心和规则之间煎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天人大战,其中的天是天地良心,人是官场规则和个人利益。

唐高宗时,在武陟县发生的一个故事,再次证明古今同理。

河南武陟县,现在隶属焦作市。唐时,武陟也是一个县,隶属怀州。而怀州,有时属于河北道,有时属于都畿道。连续几年的天不作美,武陟县发生了旱灾,并引发饥荒。县政府是有粮仓的,要不要给饥民发放粮食,县政府的官员之间观点不一致。县尉员半千积极劝进,希望政府放粮。而县令殷子良坚决不同意。县令是长官,县尉是属下。看见饥民受苦受难,员半千虽然同情又能怎样,天人大战无论如何激烈,他没有权力,只能束手无策。

恰在此时,县令殷子良到州政府去公干,离开了武陟。好,长官不在,员半千立刻动手,开仓放粮,饥民获得救助自不在话下。但是,这官场的后果可不好玩。县令大光其火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告到了怀州刺史郭齐宗那里,刺史很果断,立刻扣押员半千,启动司法程序调查,准备治罪。

顺从上级是不会出错的,古今官场,这是不变的道理。没有任何上级鼓励下属违背自己的意志。即使按照长官意志犯错也没有关系,长官会想法罩着下属,这跟黑道没有什么不同。员半千的问题很严重,他放弃了官场最基本的规则。老百姓都饿死,也不会处分员半千的,他何苦惹怒长官,自找麻烦。百姓虽然获救,但是他们无力救你出狱,牢狱中的员半千,不知道是否愁肠寸断。

还是很凑巧,正在此时,朝廷派出的河北存抚使薛元超到达怀州。刺史郭齐宗一定是大讲特讲员半千如何不守纪律,自己如何雷厉风行,结果薛元超的一句话让他立刻失去魂魄。薛元超说:“公不能自己救百姓,让一个县尉获得如此荣誉,不感到羞愧吗?”使臣代表皇帝,此话一出,即刻让事情以喜剧终场,员半千当场释放。

员半千进士出身,刚入官场,就弄出这么一档子事。后续的事情,读者也能想到,员半千后来比较顺利。武则天第一次见到员半千,说本来以为是古人呢。至于郭齐宗和殷子良,后来的史书记载,都是作为员半千的陪衬出场的,当然都是反面角色。《新唐书》甚至只提到殷子良,连郭齐宗的名字都省略了,只说是“刺史”,连反面角色都没当上。

救百姓就是救政府,古往今来,这是真理。政府是由官员构成的,官员们可以分作两类,不顾百姓死活甚至坑害民者是一类,他们是隐藏在政府内部的敌人。心中只有长官而没有百姓,这样的“人”只配做官不配做人。历朝历代的灭亡,就是在这些人手中完成的。爱民之心未泯,良心尚存,如员半千者是另一类,他们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评价一个时代,就是要看哪一类官员占据官场的上风。员半千的故事,以悲剧开始喜剧结束,这证明唐朝当时的官场,正气还是主流,唐朝得以存活的理据还在。如果,员半千这类的故事,最后总以悲剧结束,那么我们就可以预知一个朝代最后的时光,已经近在眼前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

目 录

主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主办:贵州省政协办公厅

协办: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英利医药有限公司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顾问:王正福 王思齐 龙志毅 计佑铭

编委会主任:陈海峰

编委会副主任:李月成

编委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韦林 王永进 石超 龙刚 刘晓 刘玉芳

张槐祥 肖向阳 李建国 李跃荣 何建新 陈石

陈卫东 陈庆义 陈达新 陈凌华 卞大伟 胡巍

封孝伦 侯正茂 郭正良 高金林 梁承祥 袁仁国

唐方信 唐昆雄 魏凤英

副社长 副主编:刘玉芳

文字编辑:姚胜祥 谢建平 王封礼

电话:0851-6813033

美术编辑:刘丹(执行) 兰亮 杜宁

经营中心主任:杨朝勇(0851-6812013)

办公室副主任:徐春生(0851-6823282)

经营中心副主任:吴昱(0851-6810687)

发行部主任:胡进

广告部主任:杨朝勇(兼)

法律顾问:天职律师事务所陈朝洁律师

出版:文史天地杂志社

国内刊号:CN52-1135/K

邮发代号:66-57

发行:贵州省报刊发行局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际刊号:ISSN 1671-2145

国外代号:M7505

广告经营许可证:黔工商广字 0244 号

广告发行代理:贵州文史天地经营中心

印刷:贵阳经纬印刷厂

每月 3 日出版

传真:0851-6823282

地址:贵阳市北京路 141 号 邮编:550004

邮箱:wstd3282@sina.com

博客:<http://weibo.com/wenshiandi>网址:<http://www.wstdw.com>

境外售价:5 美元

卷首论坛

顺上还是爱民

孟宪实 /1

特别话题

南海古今话主权

李占才 /4

早在 1982 年,邓小平就指出:“主权问题是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显然不只是对香港主权归属而言。

特约专稿

“反革命”罪的由来与北伐中的武昌之战

何志明 /10

人物春秋

周恩来一生中十一次历险

熊坤静 /16

出生入死,机智勇敢,临危不惧,是周恩来为理想而奋斗的有力证明。

中共五大前后的瞿秋白

张东明 /21

旷世怪才辜鸿铭

王学斌 /25

史林漫步

北洋时期的两广霸主陆荣廷

赵湘 /30

乱世出英雄,英雄有末路。陆荣廷骑墙,也机关算尽。从一方霸王到避难、下野,有不可逃脱的乱世宿命。

焦易堂和汪精卫的中医“存废”较量

李满星 /34

名臣名将

乱世清官吴存义

沈淦 /39

湘军第一猛将鲍超

杨飞 乔海东 /42

鲍超勇猛有余,但谋略不足,这大概是武人的通病吧!

西汉的打黑能人赵广汉

陶易 /46

文史随笔

一名营妓引发一场国家灾难

朱声敏 /49

沉迷女色,误事,乃至误国。

天地间莫非文史 文史中别有天地

史海钩沉

美国人“挂帅”的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 宋景田 / 51

泱泱大清，3亿子民，居然找不出一个能够“领衔”出使西洋的人，可悲可叹！

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 袁灿兴 / 55



政坛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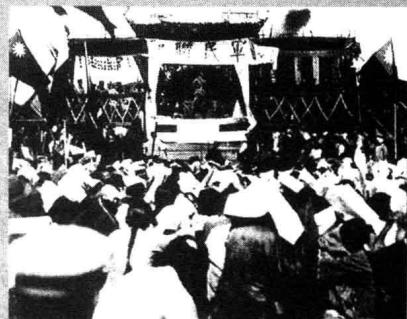
张学良与平汉铁路 郭方成 / 59

史海搜奇

大秦帝国因“鬼”变天记 王庆顺 / 64

詹天佑为慈禧修建“扫墓”铁路 李青 / 68

虽然号称“第一”，但只为皇家“扫墓”服务，这条铁路是典型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百姓人生

狂热的芒果崇拜 吴世祥 / 72

一个回乡知青的三年经历 方家印 / 75

海外历史

一场离婚案引发的社会变革 施京吾 / 79

一桩出于维护一己之私的离婚案，却意外地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真是“歪打正着”。这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长篇连载

“四八烈士”黄齐生（连载 8） 王鸿儒 / 84

编读之窗

征联欣赏等 陈德谦编 / 89

文史快车

影像站等 姚胜祥编 / 90

★若发现本刊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费用由厂家承担。联系电话：(0851)6300007

若错过邮局订阅时间，可随时汇款至本社订阅。

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授权

天职律师事务所陈朝洁律师声明

本律师经文史天地杂志社授权发表如下声明：

凡是来稿，本社不查不退，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所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文责自负，本刊不承担任何侵权及连带责任。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并有权上网发布、结集出版，稿酬不另计。其他报刊转载本刊作品，请注明并在转载前通知本刊。否则，本律师将随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代表《文史天地》杂志社追究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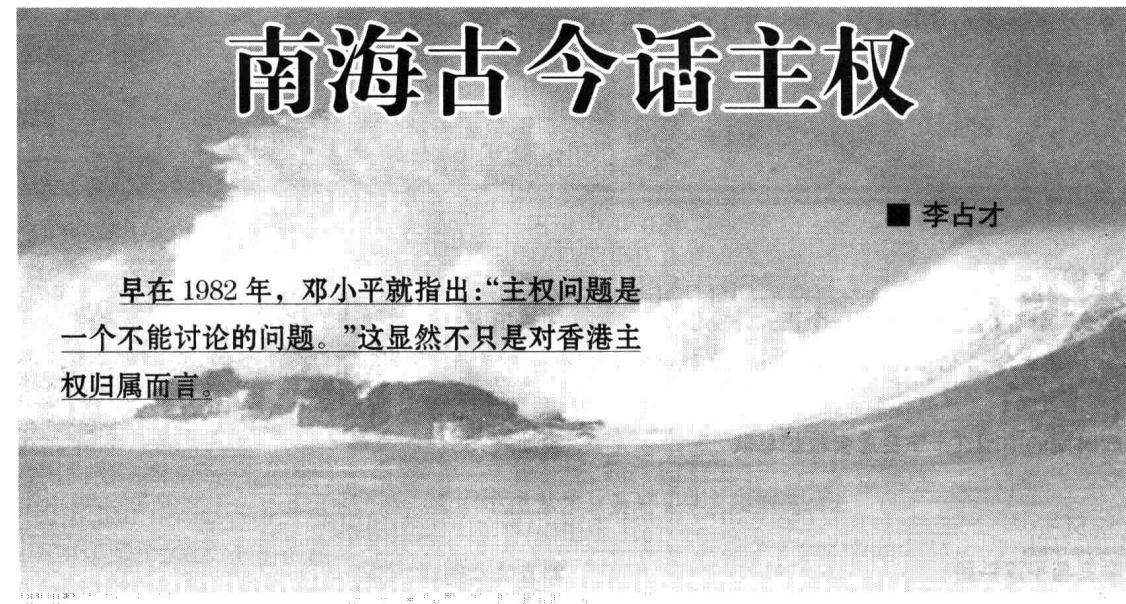
特此声明

（本期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本社联系）

南海古今话主权

■ 李占才

早在 1982 年，邓小平就指出：“主权问题是
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显然不只是对香港主
权归属而言。



中国南海，国际上也称南中国海，是指我国广西、海南、广东、台湾海峡以南，越南以东，菲律宾以西，马来西亚和纳土纳群岛以北的区域，总面积 350 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区域内，分布着大小几百个岛屿和礁盘，分别属于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本属于中国的这块领土中，近几十年来却多次发生主权争端，甚至诉诸武力。至今，除去西沙、中沙群岛、东沙群岛被中国（含台湾）实际控制外，南沙群岛大部分被有关国家强行占据。而且，有关国家对西沙、中沙的部分岛礁又在重提主权要求。很显然，南海之争是主权之争。当前，如何解决南海争端，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已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从事开发和 行使管辖南海诸岛

早在汉朝时期，中国人民就在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并予以命名，这在

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例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三国时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等。那时中国人称南海为“涨海”，称南海诸岛为“崎头”。《异物志》说：“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扶南传》说：“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唐宋年间，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将南海诸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长沙”等名称。元明清时的典籍，继续广泛沿用“石塘”、“长沙”等名称。如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有“万里石塘，由潮洲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明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标有石塘和长沙的地名。

历代中国沿海渔民一直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据《中国海指南》记载：“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亦有久居礁间者，海南每岁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它必需品，与渔民交换参贝。船于每年十二月或一月离海南，至第一次西南风起时返。”

近年在海南省渔民中发现的创作于明清时期的《更路簿》中，共收录渔民为了出海生产而

命名的岛礁 98 处,其中西沙群岛有 22 处,南沙群岛有 76 处。《更路簿》上不光标有岛屿和礁盘的位置、航行线路,还标有渔场分布情况。

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海诸岛已是常态。1918 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等组成的探险队到达南沙时,就发现那里有“文昌县海口人”。1933 年日本三好和松尾到南沙调查时也看到有中国人住在那里。30 年代的日本《新南群岛概况》记载:“昔时有中华民国渔民居住于此岛,并种植椰子、木瓜、蕃薯和蔬菜等。”

伴随着中国人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中国对南海诸岛实施管辖已成为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直至 20 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海诸岛行使着和平管辖。

《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的元朝

疆域都包括南海诸岛。明朝海军多次经过南海下西洋,视南海为自己的国土。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铭》记载,明代海南卫曾“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

自清朝至民国,我国以政府名义曾经多次为南海诸岛命名,明确主权。1724 年的《天下总舆图》、1755 年《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 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 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 1817 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1909 年清政府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军舰到西沙群岛考察,还对东沙、南沙三个群岛进行了测量和考察,为 15 个岛命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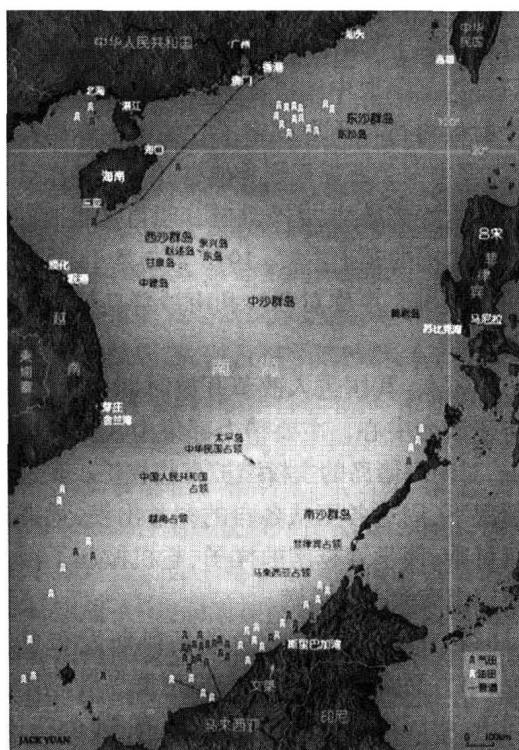
1935 年民国政府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其中公布南海诸岛地名 136 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出版了《中国南海岛屿图》,确定了中国南海最南的疆界在北纬 4 度,即曾母暗沙南边。1947 年民国政府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包括地名 172 个。

这些历史说明,南海诸岛尤其南沙群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开发经营的,中国政府早已对其行使管辖和主权。南海诸岛尤其是南沙群岛绝不是“无主地”。

国际社会和有关周边国家历来承认 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

1898 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巴黎条约》和 1900 年签订的《华盛顿条约》,都曾明确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其中就未包括南沙群岛。1951 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在申明菲律宾领土范围时,同样也不包括南沙群岛。

二战结束后,1943 年 12 月制定的《开罗宣言》、1945 年 7 月制定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其中就包括南沙群岛。美国在此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活动中一直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



▲南海诸岛地图

的主权。1955年在马尼拉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太平洋地区航空会议通过的第24号决议，要求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沙群岛加强气象观测，因为他们认为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苏、美、英、法、日等许多国家出版的地图、文献及百科全书都清楚地将南海诸岛标属中国。例如：1952年日本的《标准世界地图集》，195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世界大地图集》，1956年英国的《企鹅世界地图集》，1956年法国的《拉鲁斯世界与政治经济地图集》，1962年日本的《世界新地图集》，1963年美国的《威尔德麦克各百科全书》，1973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79年日本出版的《世界年鉴》等都明确标注南海诸岛属于中国。

从南海诸岛周边国家来看，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争议问题。1951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制定，1953年菲律宾在制定宪法时，对该条约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尤其是关于该条约中菲律宾国土范围并不包括南沙群岛的表述，菲律宾在讨论宪法这一根本大法时，没有任何人提及。说明在菲律宾国家和民间从没有南沙群岛是他们领土的概念。

197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也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提到这一问题。说明这些国家一直以来认为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1958年越南总理范文同曾致函周恩来总理，申明南海诸岛属中国领土。他们于1960年和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1974年出版的教科书，都明确载明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直到1975年，越南政府仍然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

七十年代后期有关周边国家忽然提出领土要求

历史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先后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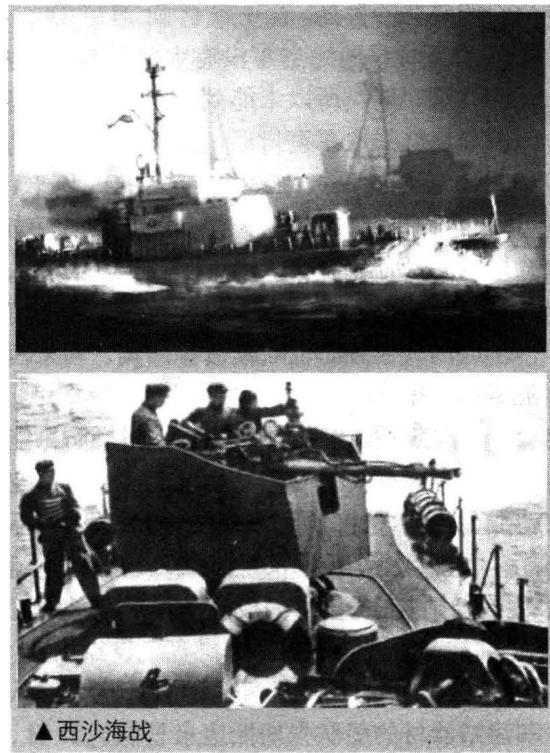
兰、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在此期间，这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占领南海周边国家的同时，有的曾经趁机霸占过我国南海诸岛中的部分岛屿。应该说，这些西方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占领，对之后发生的南海争端起到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诱发了有关国家觊觎我国领土的欲望。不过虽然这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些国家声称他们要占领一些中国岛屿，以及进行资源开发活动。但在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声明下，这些行为并未上升到严重争端。

但是，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南海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这消息一下引起了南海周边国家的躁动。第一个跳出来挑事的是当时的南越政府。1974年1月15日，南越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悍然派驱逐舰武装侵入我国西沙的永乐群岛海域，并炮击甘泉岛，强占金银、甘泉两岛。中国政府立即武装反击，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

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以后，越南也马上宣称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他们否认原来称这些领土为中国所有的表示，说当年这样说只是为了争取中国援助的权宜之计。并在这个时候自行在南海划定了它的海上市属经济区，将中国领海强行划为他有。同时，又派兵去抢占南沙诸岛共27个岛礁，明目张胆地直接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1975年2月14日发表的白皮书，声称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不久，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有些放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各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觉得有机可乘，便学着越南的样子，趁机掀起了侵占我国南海领土的高潮。

1978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发布总统令，单方面宣布所谓的“卡拉延群岛”（菲律宾词语，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有54个岛、礁以及沙洲）为菲律宾领土。并且在南海也划出



▲西沙海战

了自己的专属经济区。1978年12月，马来西亚见状，也趁机在其公布的大陆架地图上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海域标在马来西亚境内。这样划下来，我国南海南部的100多万平方米的国土，大部分都让他们给划走了。

二十年后，到1998年，越南发表《越南国防白皮书》，再次宣称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越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9年，菲律宾趁机重新绘制国家地图，将中国中沙群岛东部的黄岩岛，以及整个南沙群岛全部列入其版图。同年8月，菲律宾政府将“南沙群岛是菲领土”列为修宪内容。

鉴于事态越来越严重，至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开会，经中国努力，会上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了“共同维护南海稳定，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共识。中国政府为了落实《宣言》，还提出了一系列合作倡议。

2005年3月14日，中海油、菲律宾国家

石油公司、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共同签署了为期3年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定》。按照协定，3家公司将在协议区内研究评估石油资源状况。表面上，各方都表现出了合作意愿，也理解了中国的善意。

但是经济活动只是个表面现象，周边国家向中国争主权的实质也没有丝毫改变。从2008年起，菲律宾一些反对派开始轮番攻击《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定》。他们称菲国家石油公司2005年与中越相关公司签署的这一协定涉嫌出让菲律宾境内资源，威胁菲律宾主权完整而违宪。

至2009年，菲律宾国会就通过了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划入菲属岛屿领海基线的法案，通过立法手段强占其所谓的“卡拉延群岛”和黄岩岛。这样，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这些岛屿列入领海基线范围之内，不仅有12海里的领海主权，还将拥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菲律宾军方也开始加紧在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建设通讯和交通设施，同年，菲律宾的军用通信工程延伸至中沙海域，黄岩岛成为菲军一个新的通信站基点。菲律宾军方并频频放话：“即使装备再差，空军也会誓死维护菲领海完整。”

2009年5月，越南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单独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再次提出对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享有主权，并扬言“不怕与中国一战”。2011年6月13日，越南于南海实行实弹军事演习，目标针对中国。随后菲律宾联合美国也举行海上军演，这是菲律宾图谋吸引第三方插手，不惜使问题扩大化的信号。

中国政府对部分岛屿几次成功的武力收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经两次武力收复被

他国占领的南海岛屿。虽然那时中国空海军力量十分薄弱,但两次收复两次成功。

1973年9月6日,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内政部部长发表行政公告,宣称对全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占领了西沙群岛中甘泉岛和南沙的部分岛屿,还正式编列南沙群岛为南越福绥省管辖。

中国迅速做出反应。虽然当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同苏联对峙,但毛泽东还是下了决心要先把盘踞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赶走。随即安排海军力量最弱的南海舰队承担了收回西沙的军事行动。

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侵犯。同时,中方开始布置在有南越驻军的西沙永乐群岛当中的部分无人岛礁上升旗。在西沙驻守的南越军试图制止中方解放军和民兵的行动,双方发生了枪战。作为对中国声明和行动的对抗,南越海军总司令发布命令,1月14日派出三艘大型驱逐舰和一艘护航炮舰到达西沙群岛海域。

1月15日,与海南岛某渔业公司两艘渔船相遇。敌舰试图驱逐中国渔船,但中国渔船宁死不退。敌舰继而向甘泉岛炮击,摧毁岛上中国的渔业设施和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立即出动两艘小型猎潜艇和两艘扫雷艇,分别于17日、18日在海军航空兵掩护下,赶到西沙争议海域。19日又派出两艘炮艇增援。但中国舰艇吨位比南越的小许多,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1974年1月19日上午10点22分,西沙海战正式爆发。虽然我们的军舰吨位比南越小,船上设备差,技术落后,火力不足。但我军靠英勇和机智,只交战四个小时,即将南越军队打垮,创造了以南越海军四艘军舰一沉三伤的战果而大获全胜。南越军队狼狈退出西沙海域。中国方面乘胜进攻,继续清除了占据珊瑚、甘泉和金银三岛上的南越军队,至此

完全收复西沙群岛。

因当时我国海空军没有大型战斗机,也没有大型军舰,所以未能到上千公里外的南沙群岛海域采取军事行动。南沙群岛许多岛屿仍被南越占领。

1975年,北越攻陷南越,北越海军发布命令,命令所属单位“解放”南越所属的岛屿,包括南越军所占领的中国南沙群岛。随后南沙群岛的其他各岛也陆续被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占据。

十三年后,解放军海军舰艇对空防御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难以在远距离海空作战,并有效抗御大批飞机来袭。然而中国不能再观望,中国政府决定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中国在南沙群岛设立海洋观察站的机会,前往南沙剩余的极小的礁盘上设点。

1988年1月14日,中国运送施工部队和建站器材的船队先期抵达永暑礁。21日,以南海舰队宜宾号护卫舰为旗舰的舰艇编队进入南沙海域。23日,舰艇编队到达太平岛附近海域下锚停留。紧接着,中国方面又陆续派出南海舰队编队和东海舰队编队赶往南沙群岛海域。至3月初在南沙群岛海域中国集结了十五艘舰船,以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

见此,越南方面迅速做出反应,越南海军派出船舰,到中国海军舰艇活动海域,伺机抢夺礁盘。3月12日,中国海军开始在永暑礁建站施工。越南海军派遣三艘军舰运送117名武装人员前往抢占旁边的赤瓜礁,用以威胁永暑礁。中国海军派遣火炮护卫舰南充号前往阻止。

3月13日下午两点半,南充号到达指定位置。下午五时,越南三艘军舰进入南充号警戒雷达搜索范围内。傍晚时分,越南海军准备同时抢占3个礁盘。晚上9点15分,中国海军两艘防空导弹护卫舰赶到。晚上11时50分,中国6名舰员驾驶小艇登上赤瓜礁。接着在礁盘升起国旗并彻夜守卫。

3月14日早上6点，越海军武装运输船放下一条装载43名全副武装越军士兵和建筑材料的小船，于7点半在赤瓜礁东端登陆，并升起两面越南旗。中国海军组织58人上礁，相距210米与越军对峙。7点50分，中方派出7人驾驶小艇绕到越军后方，用菜刀砍断越方木船的固定缆绳。8点10分，中方十几名人员前进到越方插旗点，清除越方旗帜，同越方护旗人员发生肢体接触和打斗。

此时越方护旗人员打响了第一枪，中方人员马上潜水拉开距离。8点47分，越南海军武装运输船同中国海军南充号军舰开始交火。9分钟后，越军船开始下沉。8点57分，赤瓜礁上越军打出白旗投降。赤瓜礁战斗打响后，越海军登陆舰同中国海军鹰潭号、湘潭号分别交火。越军一舰起火，一舰沉没。

赤瓜礁海战，这是至今为止在南海纠纷中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在交火50分钟后结束。越海军参战的三艘舰船两艘被击沉，一艘被击毁，400人左右伤亡，被俘40多人。中国海军只有一人轻伤。中国大获全胜，越南军队退出同中国同礁对峙的所有岛礁。越南海军撤退后，中国海军舰队乘势先后进驻南沙群岛的华阳礁、赤瓜礁、东门礁、南薰礁、渚碧礁等，并在其礁盘上完成了设点。

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但胜利意义十分重大。同1974年的“两沙海战”一样，虽然仅从舰船吨位、武器装备上来说，我们并不占优势。但战争的实践说明，只要我们敢于进行军事斗争，这些强占我国领土的国家是不堪一击的。

另外，由于两次军事斗争的胜利，在西沙我们成功地夺回了整个西沙群岛的主权，领土至今在我们手上。在南沙，中国总算在这一自己的国土上有了军事存在，由过去任凭别人抢占，我们只是外交上的语言抗议，变成了今天真正的实质据有。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

目前由于周边国家的一意孤行，加之一些大国的插手，南海争端有越来越复杂化、多边化的趋势，正极大地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我国对钓鱼岛和南海诸岛争端的态度，邓小平曾经阐明过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即在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984年2月，邓小平针对有些周边国家强占我南沙岛礁，明确指出：那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多次声明主权是中国的，管你占领不占领，主权还是中国的。他还向世人多次表明，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我们决不妥协。1988年4月，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他又再次强调：“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财力和科技水平大幅增强，中国的军舰、潜艇、新型战斗机、轰炸机和空中加油机，都已具备了远程作战能力。今天中国海空军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南海周边各国海空力量的总和。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出于维护地区稳定大局考虑，尽量避免动武，仍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南海争端。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六届东亚峰会上就南海问题再次阐明了中方这一立场。对于越南、菲律宾等一再发生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千方百计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妥善处理争议，希望以此推动与南海周边各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维护地区稳定和双边友好关系大局的诚意。中国的诚意但愿能够打动对方，并有真诚的呼应。

作者地址：河北省保定市

责任编辑：翁泽红

“反革命”罪的由来与 北伐中的武昌之战

■ 何志明

在世界各国的法典中，“反革命”罪为中国
特有。其起始缘由，就有闹剧性质，而寿终正寝
实为必然。



▲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汉口的英国租界

1926年开始的那场北伐战争，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至深。北伐军在进入两湖地区，力克重要关隘汀泗、贺胜二桥后，兵锋直指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在北伐军经过连番苦战，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后，却在武昌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北伐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而武昌城攻下后，北伐军对于武昌守将刘玉春等人的审判则直接催生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特殊罪名——“反革命”罪。

一、南与北血战武昌

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后，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有素能打仗之称的吴佩孚。在北伐军凌厉的攻势下，吴佩孚寄予厚望的汀泗、贺胜两

桥失守，武汉岌岌可危，标志着他在两湖统治的终结。作为一代枭雄，吴佩孚并不甘心失败，决定布置重兵坚守武汉。8月31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汉防务。会议决定从华北调集重兵，死守武汉，还任命湖北督理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陆军第8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并从北方抽调得力部队增援。

但吴佩孚的部署尚未完成，北伐军主力第四军就已兵临武汉城下，其派遣的便衣敢死队，开始混入城内，武汉的国民党人也在积极筹划接应。北伐军的另外两支部队第七、八两军也接近武汉，形成了三路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武汉的态势。武汉附近发生战事后，城内人心颇为惊慌，民众均纷纷出城渡江逃避。如在汉口，市民们搬至租界寄存的行李堆积如山，其他物件更是不计其数。

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的总称。武昌位于长江南岸，汉口位于长江北岸，汉阳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的三角洲上。武昌是湖北的政治中心，汉口是经济中心。武汉三镇中仅武昌有坚固的城墙，城高约二丈余，城外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武昌城周围约30公里，有大小城门9座，武昌城内有蛇山俯瞰全城。城北靠长江，东有沙湖，南有洪山，西有南湖，城郊地势平坦，是易守难攻的古城，历来是兵

家必争之地。吴佩孚安排自己的大将刘玉春、陈嘉谟以1万多重兵进行防守。此外，还有驻守汉阳、汉口的刘佐龙、高汝桐两师，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的叶开鑫湘军残部等多方力量也予以配合呼应，防守力量非常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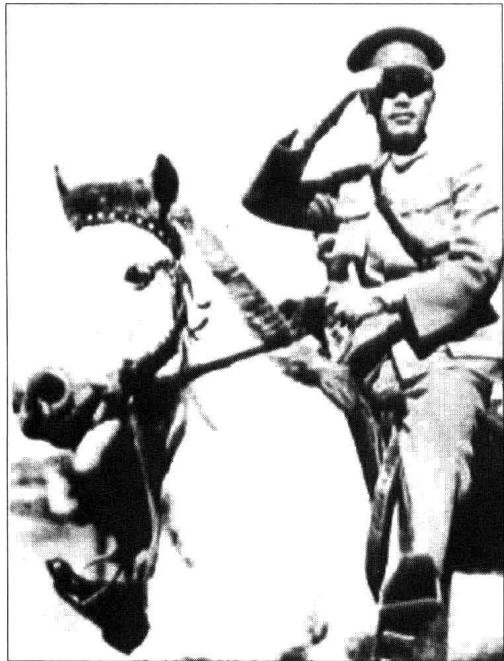
在北伐军抵达武汉城外当天，前敌总指挥部即在余家湾车站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军事形势。与会者一致认为，攻取武汉“贵在速决”，不宜拖延，而武昌之战最为难打。因此，会议决定将攻克武汉的主战场定在武昌，决定由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师负责主攻武昌；第八军负责进攻汉阳、汉口。9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专车到达余家湾后，当即下令攻城，但经过北伐军两次强攻都没有如意，而且将士伤亡惨重。9月4日晚上，首攻武昌宣告失利。

9月5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攻城司令，再次进攻武昌。蒋介石甚至还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并由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为攻城主力部队。独立团接受攻城任务后，立刻召集各营长开会，会上起初决定从全团挑选得力将士编成“攻城敢死队”，但鉴于独立团士气特别旺盛，几乎每个官兵都抢先争取参加这个光荣队伍，有些敢死队成员甚至以抽签方式决定。鉴于士兵的勇敢，会上决定不另组织“敢死队”，而由团长叶挺指定一个建制营担任。面对这一荣誉，各营都争着要担任“奋勇队”，叶挺最后考虑再三，决定由第一营担任“奋勇队”，营长曹渊担任队长。第一营成为“奋勇队”后，全营战士群情振奋，斗志倍增，纷纷留下遗书，以示必死的决心。这个壮举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在国民革命军中和武汉百姓中都流传着“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的佳话。

9月5日3时，攻城正式开始。奋勇队官兵扛着梯子及其他攻城器材，分别向指定的登城地点秘密前进。正当他们悄悄地摸到城

根，随即被吴军发觉，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射击，还投掷一团团用棉花浸油的火球。奋勇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和火球架设竹梯，有数人在竹梯中间倒下，营长曹渊也壮烈牺牲。此次攻城非常惨烈，奋勇队曾一度攻上城头，与吴军展开肉搏战，由于吴军火力严密猛烈，城墙太高，北伐军登城的梯子实在太短，最终使二次攻城宣告失败。

在久攻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对武汉实行长期围困。他下令第四军和第八军的一部负责围城，等敌军弹尽粮绝时，再发起进攻。同时，他带领李宗仁率第七军赶赴江西，指挥北伐军在江西的战事，而以邓演



▲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的北伐誓师仪式上阅兵

达代替李宗仁的北伐军攻城司令职务。围困武汉的北伐军采取了先攻汉阳、汉口，彻底断绝武昌外援的策略，决定先拿下汉口与汉阳，在劝降与武力强攻下，汉口和汉阳相继被北伐军攻克，接着北伐军再下武胜关、平清关等地，迫使吴军北退。特别是在北伐军攻占了“鄂北天险”武胜关后，锁住了吴军南下救援武汉的通道，武昌城实际上已成瓮中之鳖，而此时奉

命死守武昌的守将刘玉春则坚持抵抗。

为了封锁武昌，北伐军在武昌城周围遍布地雷，禁止邮件及交通往来。这样，武昌城内的粮草逐渐不继。为了补充粮食，刘玉春下令将城内米店关闭，以作军粮，就连正觉寺数百僧人的储粮也被查抄。无奈之下，城内居民靠糠麸、草根、树皮、芭蕉心等充饥。在饥饿中不断有人死亡，而街头的流浪狗也“寻啃露尸，双眼俱红”，境况之惨，难以言表。

北伐军也加紧对刘玉春部的宣传攻势，出动航空队在武昌上空投掷劝降传单，同时



▲刘玉春

也携带炸弹轰炸吴军阵地，炸毁其电台及蛇山炮台，给刘玉春的城防造成极大的威胁。9月17日，北伐军武昌攻城军的南湖军事会议决定，趁敌粮尽、弹缺和兵疲之机，攻取武昌。第二天，北伐军总部向守将刘玉春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

刘玉春时年48岁，河北玉田县人，他原非吴佩孚的老班底，但吴看中了他作战勇敢，故而对其十分器重，而刘也对吴报以知遇之

恩，当时即有刘玉春是吴的“赵子龙”之说。刘玉春在汀泗桥，特别是贺胜桥的战役中，作风硬朗，拼死力战，也得到了吴佩孚的赞许，遂被任命为武昌城的防守长官。武昌被围后，刘玉春仍以无线电与吴佩孚互通情报。此时的吴佩孚几无容身之地，但仍壮怀激烈，表示不日将反攻武汉，叫刘坚守武昌。刘玉春见希望尚存，慷慨表示愿意死守武昌。此刻，针对北伐军的最后通牒，他以炮轰北伐军紫金山阵地作为回应。见劝降无效，21日拂晓，北伐军下达了总攻城令。

因刘玉春等吴军将领的坚决抵抗，并且占据了有利的防守位置，使得北伐军的数次攻城都没有成功。从9月下旬起，北伐军决定采用掘地道方法，爆破攻城。被北伐军铁桶似围困的吴军，因粮尽援绝，“士兵每日只吃两餐什两稀粥”，刘玉春无奈之下只好寻求突围。10月1日和3日，武昌守军开始冒险突围，但是两次都被北伐军痛击回城。10月6、7日两天，无奈之下，刘玉春开始派人与北伐军谈判开城投降事宜。双方商定10月10日吴军全部撤出武昌，接受北伐军改编。但刘玉春拒绝在改编时交出武器，谈判遂告破裂。

此时困处孤城的守军内部也开始分裂。刘玉春部下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团长贺对庭则秘密与北伐军议降，并约定10月9日晚打开城门，让北伐军入城。这样，在该部的配合下，10日拂晓，北伐军分别从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通湘门相继攻入武昌，对顽抗北军发起进攻。大多数北军因为长期饥饿，在经过激烈巷战后纷纷投降，只有刘玉春部却依然拒绝放下武器，后来独立团将其包围后进行围歼，最后终于全歼该部。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则乔装苦力准备翻越武昌城墙逃走，被北伐军拿获，拘留在国民军总司令部。

二、俘虏与审判刘玉春

北伐军进入城后，大多数守军均已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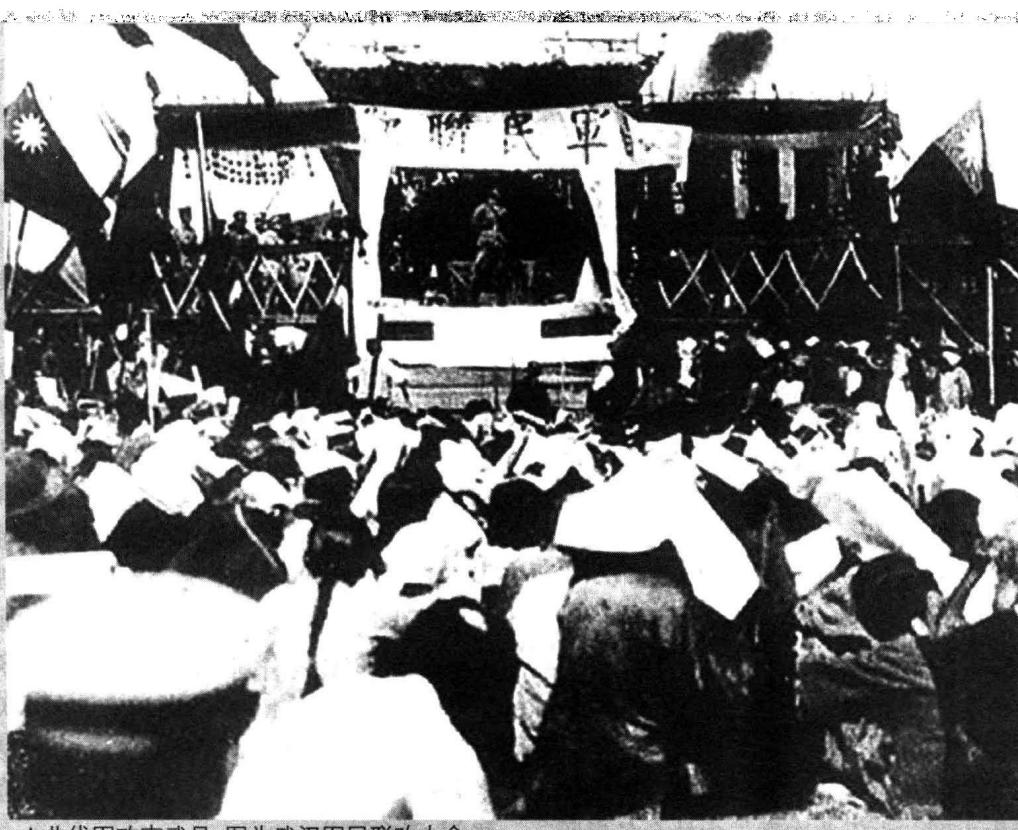
刘玉春却率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拼死抵抗，直到气尽力竭，伤亡累累。部队被打散后，刘玉春躲入一个教堂，被北伐军的巡逻兵俘虏。这样，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昌之战最终结束。武昌城内一片狼藉，据记者报道，武昌城内“已成一片焦土。所剩房屋，其中完全者亦无几。屋瓦碎乱，墙上空洞，触目皆是”。

在此次武昌之战中，北伐军俘虏了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 740 余人，士兵 9495 人，缴获大炮 18 门，机枪 160 挺，步枪 7000 余支，大获全胜。但北伐军在攻克武昌的作战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第四军就伤亡官兵 1157 人，其中军官 91 人。叶挺独立团的官兵英勇作战，191 人长眠于武昌郊外洪山。独立团团长叶挺、36 团团长黄琪翔在作战时都身先士卒，战绩卓著，成为全军将官的表率，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此破格授予叶、黄两团长少将军衔。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参加了此次战

役，他叫林彪。至此，武昌战事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如何处置率军顽抗的武昌守将刘玉春、陈嘉谟，尤其是前者，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刘被俘以后，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科长的郭沫若奉命与刘玉春进行了谈话，汉口《新闻报》于 10 月 17 日发表一篇题为《革命军总政治部郭沫若科长和刘玉春的谈话》的报道，记载了此次谈话的全过程。11 日下午 3 时，郭沫若去湖北省议会找刘玉春谈话，刘当时光着头，面呈黄色，在郭的眼中，“刘的身材在北方人中并不算高”。郭沫若问刘玉春：“你是军人。你晓得打仗究竟为的什么？难道你是硬要火烧民房，硬要饿死百姓来打仗的吗？”对此，刘玉春始终强调：“我是军人，我只晓得服从命令”，“我不能不尊重名誉。到了打败仗总是心里不好过，所以我始终要把城守住”。

而刘玉春死守孤城的“敬业精神”，在当



▲北伐军攻克武昌，图为武汉军民联欢大会

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许。北京和上海的报纸甚至将他英雄化，称赞其为“武昌笼城勇士”。特别是一批北洋将领还联名通电，“请党军（即北伐军）主持正道，勿伤南北感情”，请求武汉方面不要伤害刘玉春的性命，因为时人观之，“北伐”仅为中国南北方所进行的较量，而刘玉春又为北方人，故有此说。

在武汉方面，内部也意见纷纭。一些绅商担心北伐军若处死刘玉春，则可能会激化南北方的矛盾，进而因战火破坏原就十分虚弱的经济贸易，他们上书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称杀一刘玉春不足惜，但可能会“植南北之恶因”，劝说武汉方面网开一面；相反，另外一些武汉民众团体，则指责刘玉春“据数十万人民为护符，以图顽抗，致累及无辜，因而饿死者无算，残忍暴行，史所罕见”，强烈要求将刘玉春等人交付“人民审判”，并“速处死刑，没收财产，移赈灾黎，以平民愤”。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鉴于刘玉春案件的影响面较大，就采取了较为慎重的处理方式。为了给判决刘玉春案件提供司法支持，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为了回应民众公开审判刘玉春等人的要求，武汉方面于1927年2月9日颁布了著名的《反革命罪条例》，这个条例基本反映了国民党左派和其党内共产党人的要求。此后，“反革命”罪作为一个犯罪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国司法界。“反革命”一词来自苏联，五四以后始传入中国并被国人所接受，特别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为一些政治派别竞相采用，同样，“革命”一词也逐渐被“褒义化”与“神圣化”，成为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就在《条例》被颁布的翌日，武汉方面组织的“人民审判委员会”就开始运用它正式审判刘玉春等人。这种“人民审判”的形式则是国民党仿效苏联的产物，审判委员会由党政军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15人组成，司法部长徐谦为主席。由于此次案件为社会各界所

瞩目，因而引来记者与听众数百人。

审判正式开始后，首先由“人民论告”代表对被告刘玉春等人所犯罪行进行控告，接着由“国家论告”代表控告，指控刘等人所犯的罪行包括“抗拒革命军”、“惨杀革命同志”、“压迫革命活动”等，称刘等人“罪不容诛”，要求审判委员会迅速对其从重从快予以判决。法庭在审问刘玉春等人后，要求他们发表一段“受审感言”。此次被审判的北军将领除了刘玉春外，还有被吴佩孚任命为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但陈刘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面对指控，陈嘉谟表现较为胆怯，称自己之前因“未读革命书，不知道为反革命”，阅读革命书后，自己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甚佩服孙总理”，并“深知从前之非，实为惭愧”。但刘玉春的态度则强硬得多，他正襟危坐，称自己尽管也看过《三民主义》等书，也“甚佩服革命军”，但始终强调自己仅是服从长官命令，“不敢承认有罪”。当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指控他是“反革命”时，他以近乎诡辩的方式反驳道：“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皆反革命耶？”但对于以“不革命即反革命”为行为逻辑的国民党而言，这种辩解根本就是苍白无力的。

正当人们以为国民党肯定不会对刘玉春善罢甘休之时，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2月10日那天的审判虽然进行得声势浩大，但却以“择日再判”收场，这也预示着刘玉春的命运也将出现转机。事实上，刘玉春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还一度被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聘为军事参议。这样，武汉方面为审判刘案而“量身定做”的《反革命罪条例》，基本没有发挥功用。但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制定该条例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对付刘玉春，但实际上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武汉方面之所以在此时制定《反革命罪条例》，固然是为了给审判刘玉春提供司法依据，但其真正意图却在于“阻吓”（苏联人语）尚领兵在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武汉国民政府居然会制定对付自己总司令的条例，则无疑是令人费解的，而这就需要从当时国民党的内部派别倾轧说起。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了“联共”的基本方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始终遭到不少国民党元老的反对，而在苏联方面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被划分为所谓的“左”、“右”派别，支持“联共”政策的被划分为前者，相反则为后者。蒋介石对待这种纷争态度较为暧昧，因而被苏联顾问划为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别”。但随着自己羽翼渐丰，蒋介石对待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转变。1925年，他利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迫使共产党退出了第一军，并打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苏联顾问压制了共产党反击蒋介石的要求，而对其进行了妥协。1926年，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他在国民党“一大”闭幕时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领兵北伐，以完成孙中山的统一遗愿。

1926年仓促启动的这次北伐，居然在半年间几乎打下了大半个南中国，其胜利取得之快，可能连蒋介石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按照苏联顾问的打算，北伐军在打下武汉后，应迅速沿着京汉线北上，一鼓作气打下北京，“以竟全功”。当然，在北京被攻下之际，也就是他们与蒋介石算总账之时。因为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要把蒋介石像挤柠檬那样，“挤干，然后扔掉”。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人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老蒋率先动了手，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给“挤”了出去，此为后话。

9月初，北伐军抵达武汉城下，并将其团团围困起来。在目睹了数次攻城失利后，蒋介石决定改变战术，采取“围而不攻”的方式，同时并不按照苏联顾问的设想，继续沿京汉线北上，而是掉头转向江西，兵锋直指他的老家——浙江。蒋介石此举，无疑令斯大林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蒋攻下南昌后，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他居然无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武汉被攻下后，原广州的国民党中央随即迁入），于1927年1月在南昌另立一个国民党“中央”，以制造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而蒋介石之所以胆敢如此，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是一个关键原因。

面对蒋介石的公然叫板，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几乎束手无策，他们只好极力呼吁“提高党权”，言外之意即约束军权。同时，试图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以迫使他取消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正当此时，武汉方面审判北军将领刘玉春等人，适逢其会地为出台《反革命罪条例》提供了契机。

武汉此举的意图，身在江西的蒋介石对此亦洞若观火，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武汉方面制定《条例》，以“反革命”的罪名，把他攻击得“几无完肤”。因此，蒋介石根本不予理会来自武汉的“恐吓”，反而从中学到了一招，即将自己涂抹上浓重的“革命”色彩，如以自己为“最革命”自居，公开声称：“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此后，蒋介石仍然我行我素，直至后来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可见武汉此举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刘玉春案的审判虽然无果而终，但它直接催生的一个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则被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沿用。直至1997年，它才被更具现代司法色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所取代，而在两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中，“反革命”一词才彻底在宪法中被删除。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

周恩来一生中十一次历险

■ 熊坤静

出生入死，机智勇敢，临危不惧，是周恩来为理想而奋斗的有力证明。



▲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半个多世纪里，赴汤蹈火，鞠躬尽瘁。他先后十一次化险为夷、绝境逢生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他机智勇敢、临危从容的崇高风范，令人敬仰。

请愿被捕又获释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南开大学等学校五六千名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一路上撒传单、呼口号，来到省公署头道门大院内。一位姓邢的副官来到请愿学生面前，表示可将学生的话代传给省长。周恩来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代表学联会和各界民众，求见省长答复五项请愿条件，重点是两大项：第一，请求政府废除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要求警署释放被拘捕的代表，恢复天津原状！”

邢副官进去禀告省长后，走出来不高兴地说：“省长说了，尽管你们行动过激，他还是准备抱病接见诸位，但要诸位推选三四名代

表，请愿队伍必须退出辕门以外。”周恩来指着于兰渚、郭隆真、张若名说：“我们四人就是大家推举的代表，省长果准接见，我等负责维护秩序。辕门内外并没什么差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

双方僵持到下午5时许，全副武装的卫队忽然冲过来，将请愿队伍冲散了。军警挥舞着刺刀、枪托、警棍等，对守在辕门内不走的一部分学生大打出手，致使数十名学生受伤。周恩来等4名代表也被军警逮捕，关入死牢。

此后半年间，周恩来等人经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加之天津市各界人士的大力声援营救，他们终被释放。

“四·一二”逃出重围

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夜，国民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以议事为名，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骗到师部，拖住不让其离开。4月12日晨，26军会同从租界冲出来的流氓打手，包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有的